

2005年《纽约时报》十大好书

TONY JUDT

POST WAR

A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945

战后欧洲史 [下]

[美] 托尼·朱特 著

林骥华 唐敏 等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TONY JUDT

64

POST WAR

A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945

战后欧洲史

[下]

[美] 托尼·朱特 著

林骥华 唐敏 等译

K505
Z871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战后欧洲史. 下 / (美)朱特著; 林骧华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0.1

ISBN 978-7-80225-661-3

I. 战... II. ①朱...②林... III. 欧洲—现代史

IV. K5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62381 号

Postwar by Tony Judt

Copyright © 2005 Tony Judt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0

Shanghai Sanhui Culture and Press Ltd.

Published by New Star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战后欧洲史(下)

[美]托尼·朱特 / 著 林骧华 / 译

责任编辑: 吕 林

装帧设计: 林 涛 秦 嶷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65270477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652674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开 本: 787 × 1092 1/32

印 张: 56.625 字 数: 939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一版 2010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25-661-3

定 价: 88.00 元(上、下册)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 作者简介 ·

托尼·朱特 (Tony Judt, 1948-)

出生于英国伦敦，毕业于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和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现执教于纽约大学。1995年创办雷马克研究所，专事研究欧洲问题，世界上最著名的欧洲问题和欧洲思想研究专家。经常为《纽约时报》、《泰晤士报文学副刊》、《新共和》等撰稿。著有《责任的重负》(*The Burden of Responsibility*, 中译本为新星出版社2007年出版)、《未完成的昔日：1944-1956年的法国知识分子》(*Past Imperfect: French Intellectuals, 1944-1956*)等12部作品。

· 译者简介 ·

林骧华 复旦大学出版社编审，现任质量总监、外语学科总监、审读中心主任。译著有：《西方四大批评家》、《辩证理性批判》、《极权主义的起源》等。

唐敏 现任复旦大学出版社外语分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

战后欧洲史
POST WAR

献给杰妮弗

不复存在的往昔放在今日面前，
岂非更深刻、更富于传奇性、更具有当代性？

——托马斯·曼《魔山》

第三部分

衰退时期：1971—1989



第 14 章

降低期望

美元是我们的货币,却是你们的难题。 453
——美国财政部长约翰·康纳利,1971 年

杀人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但是有的时候它是必要的。
——杰瑞·亚当斯

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
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
——毛泽东

这是铅一般沉重的时刻——只要活着,就不会忘记。
——艾米丽·狄更森

朋客可能是为文化理论家们发明的——事实的确部分如此。
——罗伯特·海威森。

即使在 60 年代的喧嚣平静下来以前,造就这份喧嚣的独特环境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有史以来最昌盛的 10 年的最后 3 年里,战后的经济繁荣热潮结束了。西欧的“辉煌三十年”被货币贬值和经济增长率不断下降所替代,同时还伴随着大范围的工人失业

和社会不满。60年代的大部分激进分子,如同他们的追随者一样,放弃了“革命”,转而为自己的工作前景担忧。一些人选择用暴力对抗的方式;它们造成的损害和由这些行为导致的政府应对措施,引发了一些恐慌言论,认为西方社会已经“失控”。这种恐慌感被证明是夸大的:西欧各国政府顶住了压力,显示出了超出旁观者想象的应变力。但是不可能再幻想回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乐观主义时期了。

当两种外部打击使西欧经济几近停滞时,经济滑坡的影响才刚刚开始。1971年8月15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单方面宣布美国废除固定汇率制度。自从布雷顿森林公约签订以来一直是国际货币比价标准的美元,从此以后将随着其他货币的汇率浮动。而促成这一决定的背景是美国因参与越南战争而背上的沉重军事负担,以及不断增长的美联储财政预算赤字。与美元挂钩的是金本位制,华盛顿政府越来越担心国外的美元持有者(包括欧洲中央银行)用美元兑换黄金,从而消耗美国国库的黄金储备。〔1〕

美元自由浮动的决策从经济方面来看是理性的。经历了一场远在地球另一边的昂贵的拉锯战——为此付出了举借外债的代价——美国已经不可能期望继续维持固定而又不断被高估的汇率。但是美国的这一举措无疑是一枚炸弹。如果美元的汇率出现浮动,必将导致欧洲货币的汇率浮动,那么战后精心构建的货币和贸易体系的稳定性就会出现。固定汇率制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之前就已经建立起来,政府希望它能够控制国家的经济网络,现在它已经不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将会是什么呢?

随着之后几个月的混乱、两次接踵而来的美元贬值,以及1972年英国的英镑“浮动”(推迟带来了英国银本位制度这个古老而又不堪重负的角色),1973年3月,欧洲各国在巴黎召开会议,这标志着布雷顿森林体系彻底崩溃,取而代之的是新的浮动汇率制。显而易见,为此付出的代价将会是通货膨胀。由于1971年8月美国采取美元汇率自由浮动政策(以及随之而来的美元贬值),欧洲政府不得不采取通货再膨胀政策:允许放宽信贷、放任国内物价上涨和国内货币贬值,以遏制必定出现的经济滑坡。

在通常情况下,这个受控制的“符合凯恩斯理论的”通货膨胀会是成功的——除了在西德,因为自古以来德国人对物价上涨有着根深蒂固的厌恶与排斥。但是美国退出固定汇率制所引发的不确定性刺激了货币投机,而国际浮动汇率协定对此是无限制力的。这又破坏了各国政府为操纵本国利率和维持本国货币价值所做的努力。货币贬值了。随着货币的贬值,进口货物的成本相应增加:1971年到1973年期间,世界非燃料商品价格上涨了70%,食品价格上涨了100%。就是在这种已经很很不稳定的状况下,国际经济遭遇了20世纪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中的第一次石油危机。

〔1〕 美国联邦财政预算赤字由1965年的16亿美元上升到1968年的252亿美元。

1973年10月6日是犹太人日历上的赎罪日,埃及和叙利亚对以色列发起进攻,爆发了第四次中东战争。主要的阿拉伯石油出口国家在24小时内宣布削减石油开采量;因不满美国对以色列的庇护,10天后又宣布对美国实行石油禁运,同时将石油价格提高70%。中东战争于10月25日以埃及和叙利亚的停火而告终,但是阿拉伯国家对西方国家支持以色列的不满并没有随之消除。12月23日,阿拉伯产油国联合起来再次提高油价,使其上升到1973年初的两倍多。

为了解这些变故对西欧国家的影响,回顾一下石油价格的变化尤其重要。与其他几乎所有现代工业经济依靠的初级商品不同,石油价格在经济发展的几十年当中几乎保持不变。一桶沙特阿拉伯的轻原油在1955年的价格是1.93英镑,到1972年1月上涨到2.18英镑。去除那些年的货币通货膨胀因素,油价实际上是下降的。1960年成立的石油输出国家组织(OPEC)并不限制其成员国将石油储备当作政治武器。西方国家早已习惯了依赖这一充足而又廉价的石油产品——它同时又是保持社会长期繁荣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石油对欧洲经济的重要性不断稳步增加。1950年,西欧能源消耗总量中的83%是固体燃料(绝大部分是煤和焦炭),只有8.5%是石油。到1970年,使用固体燃料和石油的比例分别是29%和60%。1973年,意大利能源需求的75%依赖进口石油;而葡萄牙则达到80%。〔2〕英国曾因在北海发现了油田而一度自给自足,但它的石油开采也只是于1971年才开始。50年代末至60年代,西欧出现了消费热潮,上百万辆新的汽车开上马路,它们的动力供应既不能依靠煤、也不能依靠电,尽管那时——特别是在法国——已经可以使用核能发电,这些都极大地刺激了欧洲大陆对廉价石油的需求和依赖。

至此,进口燃料的价格是以美元的固定汇率来定价的。因此,变化浮动的汇率和石油价格上涨变成空前的不稳定因素。在此之前的20年时间里,物价和工资的上涨是稳定而温和的——在经济快速发展的阶段仍然可能保持社会的稳定——但是现在出现了通货膨胀的问题。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数据显示:非欧共同体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在1961年到1969年期间稳定在3.1%,1969年到1973年期间是6.4%,1973年到1979年期间年均通货膨胀率是11.9%。这只是整体数据,不同国家的通货膨胀率稍有不同:从1973年到1979年,西德的通货膨胀率仅为4.7%,而瑞典是西德的两倍。法国在那些年当中的年均通货膨胀率为10.7%,意大利是16.1%,而西班牙则超过了18%。英国的年均通货膨胀率为15.6%,但是在最糟糕的年份(1975年)却超过了24%。

此种程度的通货膨胀在历史上并不是空前的,但是这对于经历过50年代和60年代

〔2〕 相比之下,美国的石油进口在1973年经济危机最严重的时候,占到国内消费总额的36%。

稳定的通货膨胀率的人民来说,的确是新的体验——对他们的国家也是如此。更为糟糕的是,70年代的通货膨胀——伴随着1979年第二次石油价格上涨,伊朗革命推翻了国王统治,造成了石油市场的恐慌,石油价格从1979年12月到1980年5月上涨了150%——使人民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艰辛而痛苦的生活。在过去,通货膨胀与增长相关联,通常是由于增长过快。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都伴随着通货紧缩:由于过于刚性的货币以及政府和人民长期的消费能力不够,导致物价和工资的下降。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的欧洲,人们在传统的模式中似乎找不到解释现实的答案。

相反,西欧国家开始经历所谓的“不景气状况下之物价上涨”:在出现经济滑坡的同时工资和物价出现膨胀。现在来回顾这种情况,不会像当时那样令人惊奇。到1970年,农村富余劳动力转向城市工业生产行业的移民潮已经结束;不再能吸收到“闲散人员”,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也下降了。100%就业仍然是欧洲主要工业和服务行业的标准——到1971年,英国的失业率只有3.6%,法国只有2.6%;但是这意味着有组织的、习惯于以优势地位和雇主们讨价还价的工人们现在面对的是雇主们的利润率开始缩水。

自从1971年以来,通货膨胀率不断上升,工人代表们要求提高工资并获得其他经济方面的补偿。即便在1973年经济危机之前,也已经有种种迹象表明经济开始走向衰退。实际的工资增长已经超过了生产力的增长;利润不断下降;不再有新的投资。战后经济复苏激发的投资热情一点点被通货膨胀或者失业所吞噬。由于中东危机,欧洲的通货膨胀和失业这两个问题同时并存。

对比过去的经济繁荣,20世纪70年代的欧洲经济大萧条更显得糟糕。参照历史标准进行比较,该时期西欧的平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不是特别低,处于英国的1.5%和挪威的4.9%之间,实际上比法国、德国和英国在1913年到1950年期间的平均增长率1.3%有明显的提高。但是与不久前的过去相比,差别却很明显:从1950年到1970年,法国的年均增长率是5%,西德将近6%,即使是英国也维持了超过3%的年均增长率。20世纪70年代同50年代和60年代相比,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同。〔3〕

然而,痛苦是实实在在的,而且随着针对亚洲新兴工业国家的出口竞争压力不断加剧、进口商品(不仅仅是石油)的价格不断提高,更是雪上加霜。失业率开始稳步而无情地上升。到70年代末期,法国的失业率占全部劳动力的7%;意大利为8%;英国为9%。有些国家—比利时、丹麦—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的失业率与30年代相似;法国和意大

〔3〕 平均值毕竟只是平均值。在最低迷的1976年,英国的失业人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首次超过100万,而且年均通货膨胀率达到了25%,各国的增长率都降到了低点——意大利的国民经济出现战后的首次负增长。

利的失业问题更严重。

经济衰退的一个即时后果就是对各种“外国”工人的冷遇。虽然对产成品的需求锐减,但是官方公布的西德失业率(在1970年接近为零)却没有达到8%,这是因为绝大部分失业的工人并不是德国人——因此不被官方统计在内。例如,当奥迪公司和宝马公司在1974年和1975年大裁员时,首先被解雇的便是“外来工人”;失业的宝马公司员工中五分之四的人都不是德国公民。1975年,联邦政府永久性关闭在北非、葡萄牙、西班牙和南斯拉夫的征募劳工办事处。联邦委员会在1977年的一份报告中的“基本条款第1条”中指出:“德国不是一个移民国家,只是那些最终还会自愿回到自己国家的外国人的居住地”。6年后,联邦议会通过法案来“帮助外来工人做回国准备”。

很多外来工人,不管是自愿还是非自愿,的确回到了自己的国家。1975年,29万名移民工人和他们的家庭离开了德国,去了土耳其、南斯拉夫、希腊和意大利。同年,20万西班牙人回国找工作;而意大利的移入国内者人数首次超过移居外国者人数,很快在希腊和葡萄牙也出现这种情况。70年代中期,将近30多万移居外国的南斯拉夫人不得不回到巴尔干半岛,但是那里的就业状况并不比在德国或者法国乐观。北欧的就业危机转嫁到了地中海地区。同时,法国严格限制阿尔及利亚以及它以前的非洲殖民地国家人民入境,英国也制定了更为严格的规定排斥南亚次大陆的有移民倾向的人。

结构性失业、奇高的石油进口价格、通货膨胀以及不断下降的出口,导致了席卷西欧的财政赤字和支付危机。即便作为欧洲大陆制造业和出口业领头羊的西德,也没能幸免。458
在1973年一年之内,它的贸易支付由94.81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变成了6.92亿的贸易逆差。英国国家财政连续出现赤字——到1976年12月,开始出现严重的债务危机,以致需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出面为其作担保。其他国家也好不了多少。1974年,法国的财政收支出现逆差,而且此种状况持续了近10年。意大利和英国一样,不得不寻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帮助。对于英国出现的这种状况,它的领导人将之归咎于“国际力量”实施的不受欢迎的国内政策。

按照凯恩斯的理论,预算不足和支付赤字——如同通货膨胀本身——并不是生来有害的。在30年代,它代表了“用自己的办法”摆脱经济不景气的一种似非而是的办法。但是在70年代,所有的西欧国家都已经被社会福利、社会服务、公共设施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投入压得不堪重负。正如英国首相詹姆斯·卡拉汉所言:“我们曾经认为自己可以摆脱经济萧条的困境……我坦率地告诉你,现在这种可能已不复存在。”他们也不能指望通过放松贸易政策来解救自己,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经做过的那样:60年代中期最近一轮的“肯尼迪回合贸易谈判”已经将工业税率调到了历史低点。如果再采取什么措施的话,必将面临不断增加的国内反对竞争保护的壓力。

20世纪70年代的决策者们面临的选择具有更加复杂的因素。环境和时局引发的经济危机与政府的软弱改良相一致。在这个过程中,西欧进行了第三次“工业革命”;几年前曾与人们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浓烟工业的重要性正逐渐下降。钢铁工人、矿工、汽车制造工人和纺织厂工人都开始失业了,这不仅仅是因为周期性的经济低迷,或者是石油危机的附带后果。这是因为古老的西欧制造业经济正在消失。

证据是无可争议的,尽管多年来决策者们一直试图忽视这些迹象。在20世纪50年代,西欧的采煤业达到最高产量以后,煤矿工人的人数一直稳定下降:在比利时南部桑布尔-默兹山谷矿区,1955年的煤炭开采量为2050万吨,1968年下降到只有600万吨,而10年之后的开采量少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在1955年到1985年期间,比利时有10万名矿工失业;与采矿业相关的各种相关贸易也相应受到影响。英国的采矿业损失更大,经历的时间也 longer。在1947年,英国自称拥有958个煤矿;然而45年之后就只剩下50个了。459 采矿业工人的人数从71.8万下降到4.3万人,其中大部分都流失在1975年到1985年的这10年期间。

作为欧洲工业另一主要行业的钢铁行业也遭遇了类似的情况。因为钢铁不像煤炭那么容易被其他产品替代,所以对它的需求量并没有大幅度下降,但是随着更多的非欧洲国家进入工业生产的行列,竞争越来越激烈,导致钢铁的价格不断下降,因而生产成本较高的欧洲钢铁产品市场受到冲击较大。从1974年到1986年期间,英国有16.6万名钢铁工人失业(尽管在1986年,英国的主要钢铁生产商——英国钢铁公司取得了近10年来的首次盈利)。造船业、汽车业和纺织业都因为类似的原因受到影响。在英国纺织品和化工行业都屈指可数的考陶尔兹公司在1977年到1983年期间裁员50%。

7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使几乎所有传统行业的失业率骤增。在1973年之前,煤炭、钢铁等行业开始进行改革;之后扩展到化工、纺织、造纸和消费品行业。欧洲所有国家都元气大伤:1973年到1981年期间,在小工程公司和汽车制造企业集聚的英国西部内陆,有四分之一的工人失业。在法国西北部的洛林工业区,有28%的制造业工人失业。同年西德纽伦堡的产业工人失业率更高达42%。意大利都灵的非亚特汽车公司自从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转换为自动化生产后,3年之内工作岗位减少了6.5万个(总共的工作岗位是16.5万个)。20世纪50年代,阿姆斯特丹的产业工人数占工人总数的40%,但是25年之后,这个比例下降到七分之一。

在过去,规模如此庞大、速度如此之快的经济转变必将导致极大的社会创伤以及不可预料的政治后果。好在有政府的福利政策——也许还包括当时人民低迷的政治热情——没有太多的示威抗议,也没有激起太大的民怨。但这并非说它们是不存在的。1969年到1975年期间,西欧的产业工人举行了示威游行、静坐、罢工和向政府请愿等活动,活动遍

煤矿工人举行了两次大罢工——分别在 1972 年和 1974 年——迫使紧张的保守党政府推

461 于大规模的失业问题。要解决通货膨胀问题,只有通过对货币制度和汇率制定一些国际协定,以代替美国政府抛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1972年,欧共体原六国开始构筑“蛇洞浮动汇率制”,规定缩小欧共体成员国货币与美元之间的汇率波动幅度,只允许波动1.125%,总波幅为2.25%。这个波动幅度比欧共体以外的货币对美元的汇率波动幅度少一半。英国、爱尔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首先加入“蛇洞浮动汇率制”,但是仅仅维持了两年时间,英国、爱尔兰和意大利政府由于无力或者不愿顶住国内货币贬值的压力,都被迫宣布退出“蛇洞浮动汇率制”,让他们的货币自由浮动。法国也曾经两度加入和退出“蛇洞浮动汇率制”。很明显,需要采取更多的措施来应对当时的状况。

1978年,西德总理施密特呼吁建立一种更严格的制度以取代“蛇洞汇率制”,这就是“欧洲货币体系”(EMS)。每一成员国的货币都以欧洲货币单位(ECU)[4]定出一个固定汇率,共同对美元浮动。由于马克既是欧洲货币体系中最强的货币,又是国际外汇市场上最主要的交易货币之一,人们便常常把欧洲货币体系成员国货币与马克汇率的波动,作为中央银行干预的标志。成员国要致力于控制国内经济以维持其在欧洲货币体系的位置。这是德国首次在金融方面掌握主动权,事实上,德国马克至少在欧洲已经取代了美元。

有些国家没有加入欧洲货币体系——特别是英国,因为工党首相詹姆斯·卡拉汉正确地认识到,欧洲货币体系将阻碍英国采取通货再膨胀政策以解决国内的失业问题。而加入的国家也恰恰是因为这个原因而加入。作为“必须的解决办法”,欧洲货币体系行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或者是欧盟委员会和几年之后的欧元的职能):它可能迫使政府做出不受欢迎的决定,政府可把这归罪于外国人制定的条款和规矩。事实上,这是新安排的真正长远意义所在。他们在及时消除通货膨胀问题上并不是很成功(尽管也做了一些),但是却成功地剥夺了各国政府在制定国内政策上的主动权。

如果欧洲国家不能解决就业、高工资和经济增长的问题,其成员国必将觉得遭到背叛而变得非常愤怒。正如我们所提到过的,政府领导人的本能反应是缓和蓝领工人阶级及无产阶级的不满情绪,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受害最深,但更主要的是因为有先例证明他们最有可能成为激发全社会范围的抗议。但是,事实证明,真正的反对者却不是他们。赋税沉重的中产阶级——国有和私营企业的白领雇员、小商人和个体户——在重压和忧虑之下,迅速转化为对政府的反抗者。

毕竟,现代福利社会的最大受益者是中产阶级。当20世纪70年代的战后体系开始解体时,由于通货膨胀蔓延,由于以税收补贴衰退的工业,也由于因为预算和财政限制而减少甚至取消社会公共服务,他们觉得利益受到威胁,甚至感觉受骗上当。如同过去一样,对于现代福利国家的高税收而导致的更严重的通货膨胀的影响,中产阶级的感受最深刻。

中产阶级同时也被认为是最难“管理”的。20世纪70年代广泛流传着一种恐惧,那就是欧洲的民主党已经不能掌控自己的命运。首先,20世纪60年代破除旧习的革新引起了巨大的不安;原先看起来是令人好奇的、甚至是兴奋的、充满信心的日子,现在却越来越像不稳定和无政府状态的预兆。接踵而来的失业和通货膨胀带来了更多的焦虑,然而政府对此似乎无计可施。

欧洲政府领导人表现出来的对时局的失控,这个事实本身就是大众担心的根源——如同我们所看到的,在那些政治家身上可以发现他们坚持自己的缺点带来的好处。80年代中期,时任倒霉的英国工党政府财政大臣的丹尼斯·希利哀叹着充斥在欧洲大陆的数以亿计的存于欧洲非美国银行的美金,“那些不愿露面的人不断地将自由资金像原子云一样积聚到欧洲市场,以规避国家政府的管制”。〔5〕这正是他们的杰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哈罗德的政党正是因为对手——保守党成员——无力消除公众的不满,而在1974年成为执政党,但是在紧接下来的一年即被指责为无能。

在英国,甚至有些传言涉及民主机构应对现代危机的能力低下,涉及媒体对冷漠的局外人或非政治专家与“社团主义者”合并给政府带来利益的推测。在那些年里,英国一部分高级政治人物就像戴高乐(在1968年5月)一样,认为同警察和军队领导人会见是一条谨慎的措施,以确保一旦发生公众骚乱时能得到他们的支持。甚至在从来不怀疑议会制合法性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低地国家,世界金融体系的混乱、战后经济明显的衰退以及传统选民的不满,都给战后容易自信的一代人带来困扰。

在这些模糊而活跃的疑虑和幻象背后,存在着非常真实而又在那时看来是一触即发

〔5〕 摘自哈罗德·詹姆斯《布雷顿森林体系以来的国际货币合作》,纽约,牛津,1996年。